

目 录

海口的民族源流及其风俗习惯	冯仁鸿 (1)
海南百年建省史	冯秋泓 林尤杏 (51)
文物库藏中的“琼崖省人民政府印”	
及其印信的形制	麦穗 (57)
琼崖人民援助省港大罢工	吴坤旺 (62)
蔡廷锴赴穗述职遇险记	周心鉴 (69)
日军修建南渡江铁桥始末	欧良柱整理 (74)
海疆军消弭海口一场匪祸	周新桥 (78)
八属联军驻琼旅长邓承荪被杀经过	
	翁振民 冯秋泓 (81)
府海地区大、中学校教育史略	
	周润章 李达生 (84)

海南华侨中学史实……………符悦红 冯立奇 (108)

琼台书院创办始末……………陈多余 (133)

钟衍林的教育思想……………陈多余 (138)

琼剧名旦——丽梅……………哥 冈 (141)

海口《海南医院》创办纪实

……………温孟学提供材料 林武整理 (146)

海南岛北部地区鼠疫发生流行史料

……………林诗泉 (159)

著名中医吴华民……………林诗泉 (164)

海口市商会的回顾……………杨家和整理 (168)

琼海关开办通商日期考……………黄进先 (175)

海口私营侨批业的产生和变化……………易 春 (178)

海口长流地区村落的变迁……………吴国礼 (191)

海口市民族源流及其风俗习惯

冯仁鸿

海口市的民族与风俗，其源流纷繁，历史悠久。市区居民，多系汉人后裔，其风俗习惯，几乎无异中原。而郊区“村人”，始自梧（州）、潯（江）“贩珠”而来；滨海“蛋民”，多从闽、粤“采海”南下，其风俗习惯，又各具特色。

据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海口市有五万一千五百七十七户，二十六万六千三百零三人。其中少数民族八百一十六人，仅占全市人口的千分之三。

汉民族中，市区以操闽南方言的海南话为主，普通话和广州话也较为通用；郊区以操“村话”为主，海南话次之；滨海还有自称为“蛋家族”的水上居民，讲的则是粤方言的蛋家话；其余各少数民族居民，多是解放后因工作关系调入本市的，极少数是解放前定居的，由于受汉族同化，他们都能讲普通话。其中黎、苗族还会讲海南话，其服饰基本汉化。在汉族中，除少数“村人”老姬和“蛋民”姑娘外，很

难从服饰上辨别出来。

一般来说，凡户籍在本市者，都是海口人。但由于语言、习俗有别，人们习惯把出生本市、操海南话带有海口语音者，称“海口人”；世居郊区，操近似梧、潯语音者，称“村人”；住在海滨沙洲，操近似广州语音者，称“蛋家人”。现分别将其族属源流及其风俗习惯分述如下：

海 口 人

海南各族人民，大都源于中原大陆。海口居民，也是如此。据北宋苏东坡《伏波将军庙碑记》载：“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明代丘浚亦云：“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迁或戍，纷纷日来，聚庐此处。”海口始名于宋，最初称海口浦。自海口浦出现之后，市区居民才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

一、宦官流寓者

宋代，由于北方战乱，汉人大量南迁，不少宦籍望族，不能北归，落籍琼崖。如宦籍流寓的唐震，原籍世居广西桂林府兴安县之南乡，淳佑（公元1241—1252年）间，自台阁特奏，出任琼州刺史，成为唐氏

入琼的开山祖。生子叔建，荫授琼山县尉，开基海口东郊攀丹村（王国宪《攀丹唐氏族谱》）。子孙后裔繁衍，名贤辈出，成为元明以来海南一大世家望族，迄今七百多年。据一九八五年海南唐冑故居修建委员会统计，全岛唐氏后裔近四万男丁。

清代同治七年《郑氏族谱》称：郑氏琼崖始祖志灏公，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坎头村。南宋登进士第，授文林郎，奉旨调任昌化知县，官居三任九载。卸印后，本想回里，到白沙津候渡北归。时中原战乱，困于舟楫之不便，遂落籍琼山湓洲（湓洲即今海口白沙坊）。嗣后子孙昌盛，成为琼崖之望族，海口一大姓。

至于海口市的黄姓，原自福建莆田凤谷里来。高祖守仁，元时出任雷州别驾，曾祖受甫，任徐闻助教。因元季之乱，避兵于琼，洪武岁次辛酉（元公1831年），占籍海口第一里，成为海口市人。（明·王佐《鸡肋集·海口黄氏族谱序》）。

被誉为“有明一代文宗”的丘浚，其先世丘氏，是元末从福建泉州晋江县来海南做地方官的。由于元末之乱，无法返回故里，遂落籍府城下田村（清·道光《琼州府志》）。今海口市丘氏后裔上百户，绝大多数为丘浚后裔。

在三百多年的隋唐两代，冯（宝）洸（英）家族在琼岛一直保持着统领地位：隋朝追赠洸夫人之子冯

仆为崖州总管；唐初，其孙冯盎以番禺、苍梧、珠崖地归降，高祖李渊折其地为高、罗、白、林、阳、崖、儋、振八州，任冯盎为总管；其后，冯氏子孙世袭为官，直至晚唐尤盛不衰。在海南、海口冯氏族谱中，都承认他们是冯宝的后代。

林氏渡琼始祖裕公，字汝成，号拍庵，籍居闽之福清县太平乡平原里。唐昭宗乾宁间，曾被赐予进士出身，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授琼山县同知，莅位后晋升为琼郡同知，卒时中原多故，妻儿无法归里，遂定居府城西关。

海口历来属琼山县所辖，自宋元海口成为郡治要津之后，入琼较早的冯、林二氏，其后代在海口繁衍较多，成为目前海口市的二大主姓，人丁兴旺。

二、戎籍落户者

海口市是宋元以来水军设防的郡治要津，驻军重镇，故营居者也多戎籍。据明代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载：“原白沙水军系浙军，自宋末祥兴帝船遁道至本州，为元兵所败，遗卒收为水军，后于白沙津置镇设官管领，给粮巡防海上。”后化为当地居民，世代以行船为业，故民间有传说：海田、白沙船民，原是南宋浙江水军的后裔。而海田的“南蕃营”，则是

元初征占城（今越南）时纳降的番人及其家属，但因元末兵乱，当时已存无几（明·正德《琼台志》卷七）。

元代，琼州共置营二，镇一，寨四（清·道光《琼州府志》卷十七）。其中的营、镇均设在今海口地区，即府城西的靖海营，海田的南蕃营，白沙坊的水军镇。

明初，海南卫在琼山县境设有五个所，今海口地区便占有二个：右所，也称西所，在小英（今秀英）村，配旗军二百五十名；后所，也称北所，在海口城，配旗军二百六十二名。到了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立白沙寨（今白沙坊），配有官兵一千八百二十二名。

清代，琼州镇总兵辖下的海口水师营，有官兵九百八十五名。

在历代戎籍官兵中，不少落籍于海口市，他们亦多源于中原大陆。以清官名臣著称的海瑞，先代为南宋地方指挥使海侏，由福建迁居广东番禺。明洪武年间，海答儿从军来到了海南岛，成为琼州海氏始祖。由海答儿传四代出盐察御史海澄，传六代出海瑞（日本·小叶田淳《海南岛史》）。今琼岛海氏遗裔寥寥无几，然而海口市的道客村和白沙坊仍有后裔数户人家。

民国初期，湖南籍的清军散兵游勇数十名流落海

南，遂在海口市合伙办起了“海口马车公司”谋生，后代俱同化为“海口人”。

因此，清时黄文裕云：“郡城县城，营居多戎籍。自宋元顺化皆汉士遗裔。洪武以来，军士初拨则多苏、浙之人；续拨则多河之南北；再调则又闽、潮之产。厥后中原各处官吏充配者接踵而至，故士族多出自中州。”（清·宣统《琼山县志》卷二）。

三、商贾营居者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琼州府迁到了今府城镇，海口地区的白沙津成为郡治要津和全岛海航中枢。当时琼莞体量朱初平说：“由泉、福、两浙、湖广方面而来的商船，皆载金银、布匹，价值不下万余贯。”近则有钦、廉、高、化诸州运大米、牛、瓦器、帛物的商船，并运去槟榔、椰子、香料等土特产品。而光槟榔一项，“岁输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因此，海口市便成为琼州货物出入的集散地和商贾、船民的落籍场所。

据清·道光《琼州府志》卷八载：“天后庙一在白沙门，一在海口所，元建。”因此，日本人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论述道：“海南岛最早的天后庙，建造在元代的白沙津及海口一事是值得注意的。”

宋代发祥于福建的天后（妈祖），被信奉为海上的保护神，而当时随着福建人的海上活动，传播到沿海南北各地，也传到海南岛来。由此也暗示着福建人的通商与作为港市的白沙津及海口的联系。”各地商人，他们以谋生、赚钱为目的，陆续来到海口经商而后定居下来，以互助互利而设立地方会馆，作为同乡商民联络活动的场所。

这些会馆：有福建漳泉商人在白沙门上村创建的漳泉会馆；有泉州商人在水巷口兴建的福建会馆；有琼山、定安、澄迈牛皮业者建立的敖峰会馆；有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在博爱北路创立的广行五邑会馆；有兴化、潮州两府商人在白沙门上村创建的兴潮会馆；有高州商人在关厂坊将原高州小庙改建的高州会馆；有潮汕商人在西门外创设的潮州会馆。每一会馆，据其碑题记载，一般有一百至二百名同乡捐资助建，他们分别占籍着海口市的主要街道和港口。

四、洋人定居者

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后，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允许各帝国主义者经商、传教、设医院、办学校等，直至清末民初，外国人迁居海口市者约有三、四百人。他们多居住在外沙、盐灶、海田六庙沙尾等滨海地区。

日寇犯琼前，海口市仅有日本人胜间田“健寿堂”一家西药店，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日本人在本市建立的洋行、企业、公司、商店计一百多家。据《海南岛与其开发》一书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一日统计，居住在海口市的朝鲜人有八十七人；日本人有一千二百三十三人，仅过了三个月，即八月一日，就增加至一千五百四十一人。解放初，外国人留居海口市者约一百多人。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人口普查统计，外国人加入海口市户籍者尚存有十二人。

五、逃贼占籍者

清末，雷州半岛海盜、山匪麋集，民不聊生。民国之后，军阀混战，败者为寇，亡命深山老林，遂至兵匪合一，匪势尤炽。当时，雷州地区出现以陈振龙，号称“石合三”为首的海盜；以李福隆为首，声言有“万三三”婆罗的山盜。这两股兵匪集团，扎营结寨，分班立头，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危害甚广，地方官兵也无奈其何。因此，自清末至民国二十年间，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遂溪和湛江等地居民，避贼逃亡来海口市定居者甚众。当时在海口市盖茅草房聚居的海北寮村寨，有竹林、滨海、仙桥和红坎坡等，计有二百多户，男女老少逾千人。这些逃贼占籍者，称为“海北人”，不过其后代今已难于识别。

六、建国后入户者

一九四五年底，海口市仅有四千三百三十四户，五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人。时海口辖区仅有八乡镇，现今长流、荣山、新海、城西和海秀的部分农村不包括在内。一九五二年，发展到二万九千多户，近十二万人；一九六二年三万多户，十六万五千多人；一九七五年近三万八千户，二十一万多人。

以一九八二年统计，海口市二十六万多人中，除郊区“村人”和海滨“蛋民”六万多人外，操海南话带海口语音者约十五万人，建国后迁入者四万多人。迁入者来自全国大陆二十九个省、市、区，多数系南下干部、军人，部分则是本岛各县调来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他们一般以原籍自称，这就不一一叙述了。但其中迁入的少数民族，计有蒙古族四人，回族十六人，苗族十七人，彝族三人，壮族四百三十七人，布依族六人，满族四十人，侗族五人，瑶族九人，白族一人，土家族三人，傣族四人，黎族二百五十八人，僮僮族一人，水族三人，仫佬族一人，锡伯族二人，京族二人。去年海口市台联会成立后调查，日本侵琼时的一九四〇年五月，海口市有台湾人四百六十五人，目前仅存十三人，包括其血统亲属有一百九十人，其中台湾屏东县高山族一户四人。

由此可见，自宋元以来，外来落籍海口市者，以商贾居多。商贾中：有浙江人；有福建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人；有广西钦州、廉州人；有本省潮州、高州、化州和汕头、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人；也有本岛琼山、定安、澄迈、文昌等县人。这些落籍者中，又以闽南人为先且多。而本省各县商贾中，不少人也是始于闽浙，而后陆续南迁，最后才迁徙来本市的。他们原操的语言，也是同属于汉语种中的闽南方言，风俗习惯大同小异。因此，数百年来，海口市区的居民，以闽南裔人居多，其语言以操闽南方言者为最。而操各种不同语言的占籍者，天长日久，其语言与习俗，势必自然而然地受其影响，甚至被同化。与此同时，闽南裔人的语言与习俗，同样受不同占籍者的影响与渗透，因而逐渐形成了海南话中一种独具特色的“海口话”，成为今日之“海口人”。

临 高 人

海口市西南郊区操广西梧、潯之音的人，他们自称为“村人”，海口市民则称之为“黎人”。这些人与临高、琼山、澄迈、儋县等地的“村人”所操的“村话”基本相同。临高县“村人”占本县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约占全岛“村人”的百分之六十，因

而凡操“村话”的人，一般都称为“临高人”。为统于全局和便于行文，海口郊区的“村人”，本文也以“临高人”称之。

一、分布状况

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海口市郊的临高人分布：长流区有长流、美德、文盛、迈万、文彬、永桂、潭三新、潭三旧、文毓、琼华、儒显、传桂、道盖、博生、博抚、文丽、棠甘、联昌(苍龙)、昌明、田罗、式金、新民(那秣)、堂善、新李、道群、登宛、美李、高龙、大桥、美楠、文森、文隆、尧阁、富教等三十四个自然村；荣山区有祥堂、文明、雨苍、博养、美新、荣山、好俗、福永、龙山、富屋、大效、龙头上、龙头下等十三个村庄以及一九七三年迁居海田崩墩村的拦海大队；新海区有新海(天尾)、镇海(后海)和荣山寮三个自然村；海秀区有秀英、滨濂、滨涯、业里、向荣、水头、新村、永庄、儒益、周仁、那合、书场、美俗、苍峰东、苍峰西、头铺、沙坡十七个自然村；白龙区有玉沙和三十年代迁建的流水坡二个自然村；此外，还有日寇侵琼前迁建于今海联区新埠岛的东坡、中坡、西坡三个自然村。合计七十三个自然村，一万一千九百零九户，五万六千二百四十三人，约占郊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他们的先人迁居琼岛，比市区“客人”约早二千年。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对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族称。

二、族称溯源

1. 骆越人 古代，我国南方居民统称为越族。而位于广东西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至越南北部之民称为“骆越”，是秦汉时期“百越”族西南部分的一支。

“骆越”之称，大概源于广西邕州宣化县（今邕宁县）北有“骆越水”（今郁江）而得名，其流域为“古骆越地也”（《旧唐书·地理志》）。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挥师过琼，置珠崖、儋耳二郡。开琼之后，由于难于统治，元帝初元时，西汉金马门侍诏贾捐之（贾谊之曾孙子）主张罢郡废县，在《罢珠崖对》的奏文中，称岛上居民为“骆越之人”（《汉书·贾捐之传》）。当时，珠崖郡治在今琼山东潭；儋耳郡治在今儋县旧州坡（浦滩）。二郡之间的琼山、澄迈、临高至儋县东北部，与中原大陆隔海相陆望，是舟渡大最近的地方，也是历代“临高人”的聚居之地。据明代正德《琼台志》卷三所引临高人王佐（桐乡）在《外纪》的“四论”中指出：“此善人乃武帝之初，

已有三万之数。此远皆近商贾、兴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者。”所谓“善人”，指汉武帝“以其无罪见弃”的珠崖之民，也就是“骆越之人”，从中可窥见在秦汉时期或更早之前，广西钦州、廉州、梧州等地的骆越渔民、商贾已有迁居琼岛“采海”、“贩珠”的踪迹。故《琼台志》亦云：“越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玢、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则秦有至者矣！”

2. 俚人 东汉，珠崖人民称“蛮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唐·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里”、“俚”互训，故晋称“交州夷名曰俚子”（晋·张华《博物志》）。隋代则以“俚”或“俚僚”并称（《隋书·谯国夫人传》）。因而“夫捐之所谓人与禽兽无异，盖指猓獠；谯国传称儋耳归附者千余洞，亦猓獠也。”（《琼台志》卷三）。宋代周去非在《岭南代答》里云：“俚人，史称俚僚者也。”“里”称“俚”，“俚僚”称“猓獠”，是对所谓“类与禽兽”、“巢居鸟语”的里族人民的蔑称。“巢居”不过是“上设茅屋，下豢牛猪”的结栅之居，“鸟语”只是“重译乃通”的稀僻之言。北宋·乐史《太平环宇记》载：“毗耶山顶有虫，似伏蛇，俚人以虫为毗耶。”毗耶山位于临高县北部沿海，故临高人源于俚族无疑。

3. 黎人 唐宋之后，“黎”的族称始见于史

册。《新唐书·杜佑传》有“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临高“县北有毗耶山神，每黎人叛，则神驱蜂以御之，官军大破黎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宋建炎二年，李纲被贬过琼，居“海口地方”十二天，当时他在《南渡次琼莞》诗序云：“黎人入市交易，蛮衣椎髻，语音兜离，不可晓也。”

以上所指“黎人”，是环居沿海，入市贸易，时服时反，为民害者，可见是熟黎。“熟黎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儋县志》576页）。明朝正德时，琼府太守谢廷瑞在黎议中指出：“州县卫所等衙门皆沿边海，百里之外为熟黎，熟黎以内为生黎。”（清·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二）。可见居住海（口）府（城）郊区的是熟黎，而这一带也只有操临高话者才有称“黎”的。

生黎居深山僻壤，不供赋役，这就是深居五指山中之黎民，古代多以“土人”或“岐”称之。《太平环宇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而“生黎虽犷悍，不服王化，亦不出为民害。”明代定安人杨理在黎议中亦指出：“常川出没者为黎，五指之中历代不化者为岐”。（清·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三）。故明清常有“外黎内岐”的说法。

自明以来，海南熟黎不断汉化，故多兼有“乡人”（如儋州人）、“村人”（居昌化江下游者）之

称。而生黎归附者日增，说明熟黎中也多少含有唐宋时期的生黎成分。然而汉人也有被“临化”的。如唐氏者，宋代入琼始祖唐震，原籍广西桂林府，其十一世次祖唐天养，从海口迁居临高才成村（王国宪《攀丹唐氏族谱》），其后裔俱化为临高人。明代临高县北富罗乡英丘都二、三、四图，东塘都的第二图，西塘都的第三图，琼山县烈楼都（今海口市长流、新海等地）的第二图，皆系蛋民（《琼台志》卷十二），他们的后裔子孙也多被临化了。因而不少临高人认为他们的始祖先人源于汉人，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历史上，海口市郊的临高人，地方志书上向来都称为“黎人”。解放前，海口市民都把郊区之民称“十五村黎”、“那流黎”。十五村黎，就是指市郊的玉山、秀英、滨濂、滨涯、书场、向荣、水头、新村、永庄、业里、儒益、周仁、苍峰、头铺、沙坡等十五个村庄所操临高话的人；那流，解放后称长流，那流黎就是指长流地区（包括荣山、新海区）的临高人。解放后，市郊“村人”变化较大，现在大多数人能操“客话”，学生、青年、干部也多懂普通话，服饰和习俗也近海口化了。但迄今在老人中，仍有称他们是“黎人”或“讲黎的”。在“客”、“黎”交易中，也常听到这样的对话：“你讲黎讲客？”“不懂客，讲黎。”说明他们还自称是“讲黎话”的人。